



范丽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水库,据传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家乡很有名的土坝工程。水库旁边,有一个厂矿,乡邻们都称,这个是铀矿,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过关键的原材料——铀。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干了十几年编辑工作,但我的工作和我的这些记忆并没有过交集。记忆中,那些热火朝天的场景及关于铀矿、关于核弹的点点滴滴,似乎都隐藏起来了。

2018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篇写马兰人的文章。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连同那铸造核盾牌的马兰精神一起,直抵我记忆深处,震撼着我的内心。当即,出一本有关马兰人的书,成了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我跟社领导说了我的想法。社领导听了,很支持。于是,我联系了文章的发布者于建华老师。

听到我想出一本关于马兰人的书,于老师很很支持。作为一名曾在马兰工作过多年的退伍老兵,对马兰和马兰人,于老师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于老师用十二分的热情和认真,为此事不停地奔波,并为此聚集了一群情系马兰的人。这其中就包括本书的另外两个作者:彭继超和汪成农两位老师。

2019年元月份,趁着去北京参加图书会的机缘,我约了于老师,希望能在北京和各位老师见一见,一起讨论一下这本书。当时,

汪成农老师还特意从安徽赶到了北京。然而,这次见面,我却失约了。因为在见面前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那天的见面会,是社领导和同事代为参加的。见面会后不久,将书名初定为《中国脊梁——蘑菇云下的故事》,并为此确立了章节体例。从这时候开始,我们便一起在期盼着这本书的出版。然而,接下来却是长达三年多的等待。因为主题是书,需要核查整理的资料太多,还考虑到这种选题需要审查等因素,书稿一直没有最后成型。

让我感动的是,这期间,彭老师在接受了许多紧急书稿的撰写和节目录制的时候,还在记挂着这个事;于老师工作之余,把他的“春雨行动马兰花”的慈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不太熟练电脑操作的汪成农老师,一直在坚持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编写着基础资料。

今年3月,当我读到书的初稿时,感觉所有故事都没有过多的渲染,很朴实,很真实,朴实得如同故事中的一个个人物,真实得如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就浮现在眼前。朴实、真实的故事最容易打动人。这次,我是实实在在地被这些可爱可敬的人感动了。在这里,我不想说编辑这本书有多辛苦,有多耗时,我已记不清自己反复审读、修改了多少遍稿子,我也记不清这一年里我有多少个夜晚和周末都在反复地梳理和编校每一个故事。我只想说,我读着这些故事,内心很受触动,就感觉有股力量在推动,在鼓舞着,让我

很有激情去做这本书。虽辛苦但不觉得累,感觉所有付出都值得,这就是这些故事的力量。

在众多书名中,我提出的“我是马兰人”这个带着马兰情怀、具有代入感、能体现马兰人的自豪感的名字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稿子整理好后,首要的大事便是给马兰基地进行审查。当听到基地工作人员都被这些故事所感动,甚至把文稿复印了拿回去讲给孩子听时,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感动和惊喜。但等待的日子显得格外漫长,所以当基地的意见拿到手上时,我心中充满了欢喜。

时间来到了今年的8月下旬。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纪念日,要是这本书能在今年10月16日之前推出来,是最好的。所以,一切都在紧张地往前赶。8月30日,当得知党的二十大将在10月16日召开时,一切更是进入了加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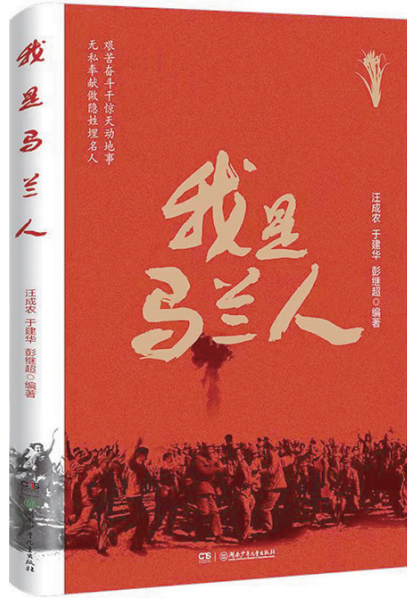
这期间,我心中的弦一直紧绷着。终于,在众人忘我工作的情况下,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本书完成了所有的编校、封面定稿、音频制作、质检等一切程序。在国庆长假的前一天,书终于下厂印刷了。10月16日,是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日子,也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8周年的纪念日。这本与党的精神和两弹事业密切相关的书,终于在此之前出版出来了。

因为这本书,我遇见了更多充满激情、甘愿付出的人,遇见了更多的美好和感动……如今,家乡的铀矿厂早已不存在,但那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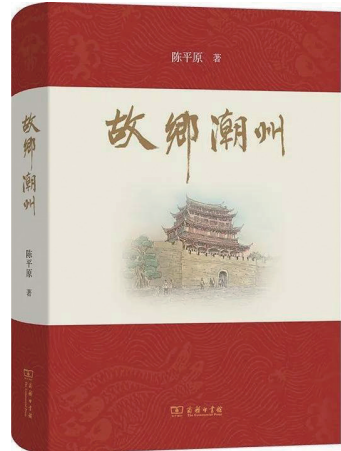
库还在浇灌着家乡的广阔土地,养育着家乡的人们。

马兰精神是一种需要继承和发扬、需要创新和延续的中国精神。在这本书里,我们并不能读到所有马兰人的故事,但它带给了我们一群让人感动的马兰人。这本书,带给了我马兰精神,相信,它也会将马兰精神传播得更远、更广。

(《我是马兰人》,汪成农、于建华、彭继超 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走马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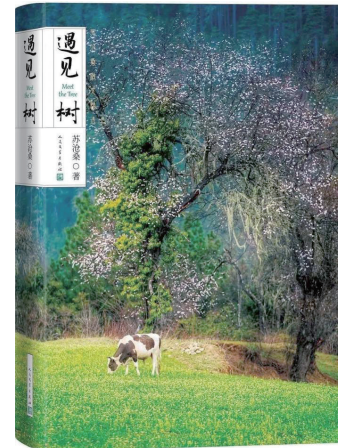


《故乡潮州》
陈平原 著,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对于故乡潮州的一次文化探寻,也是“却顾所来径”的深情回望。

书中以“潮州”为题,论文、随笔、演讲、序跋,体裁丰富,指归却一:故乡。无论是体味故乡的地域特质、生活方式、文化品格,还是谈论故乡的地方文学、乡土教材、文化名人,都是一种别样的“返乡”。至于那些对童年与青春的记录、对亲人的念怀,更是与读者分享的自家心情。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今日的我们,该如何怀乡,如书中所言:“不妨就从自家脚下,一直说到那遥远的四面八方。”



《遇见树》
苏沧桑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遇见树》是当代散文名家苏沧桑继《纸上》之后推出的又一本精品散文集。苏沧桑的文字被称为散文界的“天籁之音”,多篇文章入选全国各类散文年选、各省市中高考试卷和各类教材读本。

作者有一双善于发现万物之美的眼睛,无论是故乡海岛的山山水水、古村古镇,还是西北塞外的荒野戈壁、古城遗迹,在步履不停的行走中,她与山水和大地上的人们产生深情的羁绊,更与真实的自己直面相对。

本书所选篇目,分为时光篇、故土篇、乡野篇、手艺篇、古迹篇五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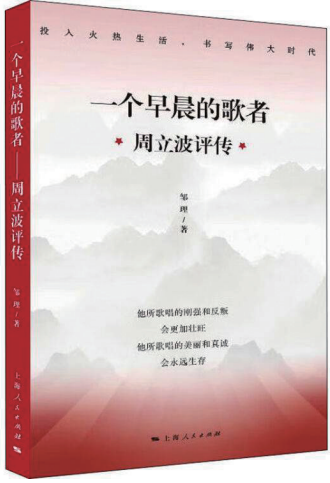


读有所得

周小仪 舒莉莉

邹理的《周立波评传》(2022年出版),是她第三部关于周立波的专著,也是对周立波传奇人生最为完整的记录。

邹理的第一部专著《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周立波与外国文学》(2018年出版),全面梳理了外国文学对周立波创作的影响。作者认为周立波的创作虽然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但他是一个具有世界情怀和



好书摘读

王笛

或许有读者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读书呢?这个问题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我们每天的时间是限定的,除了吃饭、睡觉、做家务、工作、上下班,所剩时间就非常有限了。大家都有多读书的愿望,但是无奈时间不多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我也纠结于这个问题。在教学和科研之外,很少有其他时间读与自己工作性质无直接关系的书,但是这个状态在我眼睛出了问题以后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2014年3月,那时我还在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当教授,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右眼突然发生视网膜脱落。

根据医生的说法,右眼视力不可能恢复,因此,我必须考虑,是为了保护好仅存的左眼,放弃学术的追求,从此“躺平”,还是不放弃,不认输,继续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当然我的选择是后者。在当时眼睛手术后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我决定采用听书稿的办法。

最近六七年来,无论多么忙,我平均每天的读书时间应该不少于两个小时,手机成为我的读书利器。

这样,从起床穿衣整理床铺,到洗漱早餐,走路到办公室,或者外出办事购物,在家打扫卫生、做饭洗碗,或是饭后散步,我都可以听书。如果有时候失眠睡不着觉,或者是醒得太早但是又不想起床,就打开听书功能,时间一点都不浪费。而且现在蓝牙耳机的续航都可以几十个小时,非常方便,听书的时候也不会打扰旁人。

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 ——谈谈《周立波评传》

国际眼光的作家。正是他的世界性、现代性成就了他的民族性、地方性。后来邹理又写了一部《周立波年谱》(2020年出版),涵盖了周立波生平、创作和研究现有的几乎全部资料。这部长篇年谱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周立波从出生到去世的丰富细节,具体到每一天,非常扎实,有很重要的史料意义。她的第三部著作是史料和研究的有机结合,既有对历史材料的详细记录,又有对周立波作品和生活思想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这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好作品。

这部书对周立波作品的研究有很多出色的见解。比如在周立波研究中十分薄弱的报告文学和新闻写作这个方面,邹理提出了蒙太奇的概念。通过蒙太奇寓象多于统一的风格,来把握周立波报告文学的表现形式,这在周立波研究中观点独到,非常适合描述周立波的报告文学。读者在这部《评传》中可以看到,报告文学的这一历史和美学功能在周立波手中发挥出怎样闪光的异彩。

作者对周立波的现实主义的评述也有独到之处。她用韦勒克的现实主义理论,恩格斯的典型性理论和周扬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周立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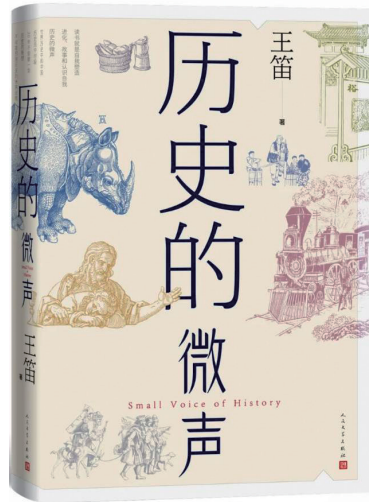
和他的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非常熟悉《山乡巨变》中那些人物原型,用这些人物的原型和作品人物进行对比,是一种非常好的实证主义和文化批评方法。

作者还将周立波和肖洛霍夫做了对比。众所周知,苏俄文学对周立波的影响非常大,周立波的小说人物与苏俄文学的人物模型一脉相承。邹理指出,在景物描写方面,苏俄文学对周立波的影响也是如此巨大。俄国文学作为整体所蕴含的宗教情怀、乌托邦精神和深沉的苦难意识,还有契诃夫式日常生活情趣和幽默,在周立波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邹理的这部评传还涉及“文革”的一些情况,如周立波散文《韶山的节日》所引发的文案以及它对周立波的影响。当事人的回忆包含很多史料,都还原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我们平时很少注意到的生活内容,在这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

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周立波的成长轨迹、他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并从具体入微的生活细节中感受到周立波的思想性格。相信这本书在当代中国文学和周立波研究中,会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周立波评传》,邹理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疫情暴发以后,让我更多地去思考人类的命运。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认识国与国的关系。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境地?

其实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模式,以世界和全球的眼光,对我们自己或许会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虽然世界在疫情的打击之下,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加剧,但是我仍然相信各国互相依靠,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才是走出疫情的根本出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那种所谓的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中国想法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现在仍然需要拥抱世界。不仅仅是世界需要我们,我们也更需要世界。

(《摘自《历史的微声》,王笛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写我书

书籍自有命运

张伯伟

拉丁诗人泰伦提雅努斯·马乌曾经说:“书籍自有命运。”诗人的话常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适用于本书。

本书原是“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种。1992年《光明日报》上曾广播“英雄帖”,向全国征集各志作者。《艺文典》主编是刘梦溪先生,似乎对《散文小说志》和《诗词曲志》的应征者不甚满意,所以亲自约稿,前者由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撰写,后者则由我承担。

写作工作始于1993年,1995年初交稿,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百部巨帙,堪称豪举。但令人遗憾的是,赠送作者30册样书以外,全书以成套出售的方式发行。所以除了经济实力较强的图书馆入藏,个人几乎无力拥有。它虽然曾经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时的礼物蒙受殊荣,却很难成为普通读者案头邮架之物。

也许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十多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希望单独印行本书,或照旧或增写,而我当时忙于域外汉籍研究事业的开拓,兴趣被“瑰奇异境”所吸引,无心“却顾所来径”。四五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欲出版本书,那时,“拨弄旧琴弦”的工作已不至于使我厌烦,如果编辑稍加督促,也就不会功亏一簣了。前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礼先生再提此节,并且列入议事日程,我终于决定摆脱琐事,利用寒假完成了本书修订,它也终于有机会以平凡的形象与读者见面了。的确,“书籍自有命运”!

说是修订,其实更动极为有限,只是调整了若干字词语句的表述,改正了个别讹误而已,书名则易为《中国诗词曲史略》。

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其著作追求的是“会通之旨”,意欲“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本书无此奢望,但也追求能将中国诗词曲当作一个整体而“条其纲目”,使普通非专业读者对于中国诗学的特征、演变、价值和意义有一基本认识。所以,本书既不刻意追求独创性,也不列举炫耀稀见文献,只是对被历代公认为“杰作”的作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个人解读。而“杰作”的选择标准,也往往以被我记住的作品为基础,我确定这不是一份冗长的清单,但可能因此而与很多读者记忆中的作品相吻合。

当然,作为“文化通志”之一,本书会着重考察随着这些作品带入的文化印痕,并力图透过审美活动加以开发研讨。2010年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集合了众多美国名校的名教授执笔,其写作方法,据主编序言所说,是“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从而成为该文学史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与贡献。而在20世纪末出版的本书,采取的恰好也正是上述视角,但篇幅不足其书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我的叙事远远少于我的省略。但愿能借用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第十六版前言中的话:“某一方面的任何所得都可能导致其他方面的所失但是我真诚地希望所得远胜于所失。”

如果今天重写本书,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可以得到改善:一是知识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扩大,在知识的全面性方面,今天总是比过去更为均衡,这足以使某些章节的论述可以避免匆忙和肤浅;二是观念上的,经过三十年来对域外汉籍的耕耘,我会更加注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影响,在讨论中国少数民族和域外汉诗的时候,不过于强调汉文化的同化力和辐射性,而是尽力展现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互动。

同样,在讨论20世纪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时,除了纵向梳理传统诗词曲中白话成分的逐步增强,对于翻译文体和外国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会增加评价的强度和力度。

然而就整体来说,我对本书论述的基本框架和结论仍然持肯定的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维持其原貌让她重新面世。

最初交出书稿时的我——36岁,如今再次出版时的我——63岁,时隔27年重新打量这部著作,让我想起意大利学者兼作家翁贝托·艾柯,他在26岁撰写了《中世纪之美》,54岁为该书的英译本写《再版前言》,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在这本小书中,我以年轻学者的笨拙方式讲述了一个故事,但时至今日,我依然相信这个故事。”我对此深有同感。

今天,南京降下了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窗外一片银装素裹,不知什么时候,脑海里飘来两句陶渊明的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中国诗词曲史略》,张伯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